

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Im Banne Chinas*

为中国着迷

历史多情，历史多思，读了《两个世界的回忆》和《为中国着迷》以后，我们将会有所感悟，有所感叹。我们会尊敬与怀念在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致力于不同文化的交流的前人，我们会在会意的笑容中泛起一层泪光，愿这个德国家族的前辈友人安息，愿中德文化人的情意千秋万代地继续下去。

王康

傅吾康是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和汉堡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他精通中、英、德文，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史，著作丰富。全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傅吾康各时期的经历，多参照作者日记、书信以及发表的文章、报告等写成，完整地呈现了傅吾康先生一生的中国情结——他的求学、婚姻乃至治学、事业无一不与中国密切相关；一个德国人一生为中国着迷，而且是心中始终安放着一个中国，为研究和传播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奉献了全部身心。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097-3961-7

定价：99.00 元

思想 [德] 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 著

为中国着迷

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Im Banne Chinas

欧阳彪/译 李雪涛 苏伟妮/校 [德] 傅复生 (Renata Franke) / 审定



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国际公认的杰出汉学家。作为德国汉学前辈福兰阁先生之子，傅吾康受到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德国完成汉学学业后，来到中国，在此度过了13年的青年时光，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著述，并且与中国太太胡隽吟组建了互爱互助的家庭。他强调研究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书斋，严谨治学；辛勤地教书育人，培养汉学人才；荣休后仍奔波在东南亚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东南亚华人的历史；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本自传中，傅吾康先生娓娓道来，讲述自己在东方和西方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们不仅可以了解一位认真谦虚的德国汉学家，更可以感受到一位正直和善的国际友人格守“中庸之道”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中国那份融入生命的热爱。

Franke, Wolfgang: Im Banne Chinas (Teil I)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 - 1950

© projektverlag 1997

ISBN 3 - 928861 - 95 - 6

Franke, Wolfgang: Im Banne Chinas (Teil II)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 - 1998

© projektverlag 1999

ISBN 3 - 89733 - 039 - 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上、下部分别根据 Projekt Verlag 出版社 1997、1999 年版译出

感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赞助

中文版前言

傅復生博士

(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我非常高兴，能在我已故的父亲、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中文版。

该回忆录原文为德语，分上、下两册。现在，呈现给中文读者的是将两者合并起来的一套完整传记，记录了我父亲从出生至1998年的大半生经历。自传上部（1912~1950）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校园时期、汉学求学时期以及解放以前在中国的13年岁月。自传下部（1950~1998）包括了他任汉堡担任汉学教授的职业生涯，在美国、马来西亚、日本、中国等地担任客座教授和研究员的见闻，以及参加世界各地的会议或者旅行度假的情况。为了让大家对最后10年的生活留下一些印象，在自传后面附加了他定期于每年圣诞节寄给亲朋好友的8封年信。最后一年即2007年的生活，在他去世的讣告中加以简短概括。此外，德语版本中有他中青年时期的照片，此次中文版本增加了他中老年时期的几幅照片。

非常感谢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通过谢爱萍女士的介绍沟通和苏伟妮女士的具体工作，推动了这本自传的最终出版。同时，由于她们的努力，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对这一翻译出版项目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样要感谢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涛教授，通过他的积极奔走和不懈努力，最终促成了该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的出版。在此，一并感谢该出版社编译中心祝得

彬主任的细致工作，以及与马来西亚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国项目出版社（Projekt Verlag）的弗雷德·普施（Fred Pusch）博士慷慨地将该书版权转让给我，便于其翻译成中文顺利出版。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翻译欧阳甦，她不但很有耐心地容忍了我的所有异议和批评，同时在这一堪称榜样的合作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2012年3月于柏林

序

王蒙

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父亲王锦第那年担任北京的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我们租了位于大翔凤胡同的一个二进院落居住。父亲做了装修，安装了当时极为罕见的上水下水、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迎接傅吾康叔叔的到来。

傅吾康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他与父亲过往甚多，在北海公园，他们似乎共同拥有一艘比较小的木制游船。傅教授多次把我放在肩上，与父母姐姐一起，到达北海公园后门，先上船坞，取出船来，再泛舟太液池上，一享清爽，我们还有在五龙亭吃小窝头、豌豆黄的经验。那是先父一生中生活比较优裕的一个短暂时期，也是我父母关系相对稳定的一个短暂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我，是与傅叔叔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直至“文革”，我听父亲说，傅教授曾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时随同德方的政府代表团重访过北京，他们也见过面。我当时在新疆，不知其详。

1980年我首次访问联邦德国，有一站是汉堡，听说傅教授家住在那里，我很兴奋，似乎有缘与童年的、后来中断了的记忆有所续接。果然，经汉堡大学协助安排，到达汉堡当天晚饭后，我到了傅先生家，可惜，傅先生不在，我只见到了傅夫人、华裔的胡隼吟女士。我在他家的客厅墙上看到了小时我家里常常看到的郑板桥的书法拓片：“难得糊涂”。我想，也许这是父亲当年送给傅先生的吧，如果不是傅先生另有来源的话。反正我们家里，后来再没有见过这个“难得糊涂”。

胡女士原在京有房产，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她得到几处公寓房的补偿，他们一家，来中国、来北京越来越勤了。

1985年，我率团参加于西柏林举行的地平线艺术节时，又有缘与傅先生的女儿傅復生相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1993年，是时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做客的傅先生帮助安排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我与妻子首次访马。

逝者如斯，胡女士与傅先生先后作古，我也年逾古稀了。2008年访问德国时会见了復生，得知了不仅傅吾康先生，傅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位德国的著名汉学家，他们的治学历程，正是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程，他们是汉学家，他们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

现在，由傅復生等编辑翻译的两代德国汉学家的回忆录即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记载，而且是友谊，是情致，是见闻，也是命中注定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历史多情，历史多思，读了《两个世界的回忆》和《为中国着迷》以后，我们将会有所感悟，有所感叹。我们会尊敬与怀念在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致力于不同文化的交流的前人，我们会在会意的笑容中泛起一层泪光，愿这个德国家族的前辈友人安息，愿中德文化人的情意千秋万代地继续下去。



2009年，北京

到目前为止,命运的力量对我如此慷慨,使我免遭了很大的不幸和痛苦。我一生中有五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们是:1. 1928年转学到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和紧随其后的汉学学习^①;2. 1937年出国前往中国,使我免于纳粹的恐怖和战争^②;3. 认识胡雋吟并与其结合^③;4. 应聘前往汉堡担任汉学教授^④;5. 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东南亚海外华人及其历史以及相关的旅行。

回顾过去,我的学术水平没有达到我父亲福兰阁的高度,不过我也不会接受他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我认为,自己并非完全一事无成。这一点,不仅要感激我父母给予的教育,尤其是我亲爱的母亲,而且大部分要感谢我的中国伴侣胡雋吟。此外,福华德对于我的学术培养和献身学术研究的志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留下几句话谈谈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我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在新教家庭里长大,参加过坚信礼,举行了基督教结婚仪式,并促使我的孩子接受基督教并受洗。但是,我几乎不能被称作“有信念的基督徒”。让我引用维舍尔的话^⑤,他写道:“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它们给予彼此的伤害要

大于相互受益。”^①从1937年离开德国开始,除了参加离世的亲朋好友的葬礼,我不再进行基督教的礼拜,但我并没有退出教会,至今仍然缴纳教会税。我感到极其厌恶的是大多数落户于美国的、攻击性极强的基督教派以及他们在亚洲令人讨厌、狭隘的传教方式,这一方式有时候会损坏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与此相反,我对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例如利玛窦等人却极为敬重,他们追求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的价值观结合起来^②。我相信感动一切的万能的力量,这似乎能与中国的“道”类比。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可能与基督教的基本人文传统相符合,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不对立。

最后,感谢所有以各种形式帮助我撰写这本自传的人,特别是维耶讷·布格尔,他反复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刘奋明和施泰格尔也同样阅读了大部分手稿。特别要感谢马汉茂及其小组为本自传提供的意见、编辑和排印。没有他们和其他一些人的帮助,这本书绝不可能以目前的样子出版。

柏林费希滕堡山,1998年8月

附:本书尚未印刷完成以前,我们就不得不为马汉茂的早逝而感到悲痛,他去世于1999年6月8日,年仅59岁。汉茂大概是他那一代人中风格最为独特、最具创造力的德国汉学家,几乎无人能取代。没有他的努力,本书也无法出版。

1999年8月,傅吾康

① 参阅上部第25-28页。

② 参阅上部第61页。

③ 参阅上部第90页。

④ 参阅上部第179页等。Auch Einer. Eine Reisebekanntschaft. Hrg. von Martin Frehsee, Berlin 1925, S. 484.

⑤ 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维舍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 1807-1887),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编译者注

① Auch Einer. Eine Reisebekanntschaft. Hrg. von Martin Frehsee, Berlin 1925, S. 484.

② Bibliographie Nos. 198, 212, 240.